

清文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編輯工作委員會

主 任 曹維勁 張英光
執行主任 雷群明 翁經義
委 員 (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界雲 沈兆榮 周清霖 柳肇瑞
翁經義 曹維勁 張英光 張建一
張莉琴 湯世梁 雷群明 劉文祥

審 稿 柳肇瑞 周清霖
總體美術設計 沈兆榮

《清代文化》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朱誠如
副 主 編 任萬平
編 委 (按姓氏筆劃爲序)
于慶祥 朱賽虹 汪 元 周京南
馬雲華 孫 欣 陳連營 曹連明
魚宏亮 劉 暢 劉立勇 嚴 勇

攝 影 馮 輝 胡 錘 劉志崗 趙 山
宗同昌

本書由上海文化發展基金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文化 / 朱誠如主編. —上海: 學林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 12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
ISBN 978-7-5486-0122-7
I. ①清... II. ①朱... III. ①文化史—中國—
清代—圖集 IV. ①K249. 03-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32771 號

書 名 清代文化
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學林出版社
上海欽州南路 81 號 3 樓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冠生園路 393 號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制 版 上海當納利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青浦工業區崧澤大道 7699 號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區漕盈路 3333 號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規 格 8 開 (228×305mm) 512 面
書 號 ISBN 978-7-5486-0122-7/K·9
定 價 陸佰捌拾圓

圖片說明 朱誠如 任萬平 于慶祥 朱賽虹
汪 元 周京南 馬雲華 孫 欣
陳連營 曹連明 魚宏亮 劉 暢
劉立勇 嚴 勇

責任編輯 周清霖
美術編輯 魯繼德
裝幀設計 魯繼德

出版前言

中國和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並列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在這四大發源地中，古代文化保存得最系統、最完整的，惟有我們中國。中華五千年文化不僅有大量的文字材料，而且有極為豐富的出土文物，其中包括精美絕倫的青銅器、玉器、陶瓷器、雕塑、繪畫和其他藝術品、工藝品等等。這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繼承和發揚光大我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是走向新世紀的我們這一代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1990年，學林出版社在陝西省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王仁波先生主編的大型高級圖冊《隋唐文化》，用圖文並茂、以圖為主的形式，生動地反映和表現了隋唐兩代的文化精華，受到了專家和一般讀者的廣泛好評。各方面普遍希望繼續以同樣精美的形式對中華五千年文化作系統的介紹，再現它的燦爛輝煌和發展軌跡，於是就有了這套“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的總體構想。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圖冊邀請全國第一流專家編纂，他們有文物、考古、歷史等方面的深湛理論素養和實踐經驗。參與編纂的專家學者與出版社共同商定，這套圖冊要力求體現最高的著述水準、最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並以一流的彩色圖片、新穎的版式設計、精美的印刷裝訂來製作，實現學術性、知識性、鑒賞性、實用性的統一。“系列”的每一冊所反映的，既是五千年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反映歷史的連續性，又是五千年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存在，體現出該歷史時期文化特有的風貌，在眾多古文化整理研究讀物中，以它的鮮明特色和永久價值而獨樹一幟。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由學林出版社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共同編輯製作出版。這也是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探索出版社之間合作的一種有益的嘗試。對於書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熱忱歡迎批評指正。

對於“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編輯出版過程中給予我們各種支持幫助的專家學者、編校印製人員和有關領導、有關業務人員等，謹致以深深的謝意。

學 林 出 版 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年8月

Preface

China, Egypt, the Tigris and the Euphrates Valley and India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be the four major sourc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mong them, China alone has preserved the most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cultural legacies from ancient times. Written literature in abundance and unearthed artifacts in large quantities, including elaborate bronze wares, jade articles, pottery and porcelain wares, graven objects, paintings and other artistic objects and handicrafts, speak volumes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y are valuable treasures bequeathed to us by our forefathers.

As a new generation of publishing men marching towards the new century, we are duty-boun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excellent cultural legacies of our civilization. Academia Press, with solid and liberal support from Museum of Shanxi Province, published an exquisite and grand illustration book *The Culture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Tang Dynasty* in 1990, with Mr. Wang Renbo as its chief editor. The book vividly shows the cultural essentials of the two dynasties with illustrations as its principal form and written words as a supplement, and has won wide praise from both experts and readers in general. Great hope has thus been stirred up among readers of different circles that further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in the same exquisite form should be made to redisplay its grandeur and retrace its developments. Hence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of this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ies*.

This series is written by a number of first-rate experts across the nation, who are reputed for their profound knowledge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on artifacts,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etc. The compilers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they should strive to show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this series, and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value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by virtue of fine color illustrations, novel designs, refined printing and binding. Each book in the series could be well regarded either as an indispensable link in the chain which reflects historic continuity or as an independent link in the chain which reflects unique cultural features of each period in the history. This series with such merits as conspicuous characteristics and ever-lasting values will occupy an outstanding position among numerous books on ancient culture.

Academia Press and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 will make joint efforts to work out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ies*, which is a valuable try to explore new possibilities of co-publishing book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opening and reform. Criticisms of any defects in the series are welcome and sincere thanks are extended to the experts, scholars, editors, proof-readers, printers and the leaders concerned and other people involved who have offered their help and support in various forms in the whole process.

Academia Press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
August, 2000

Contents

Introduction: Writing Symbols, Bronze, and Multiculturalism

Chapter 1: Cities and Palaces

City wall/palace/the architecture features of the Shang–Zhou capital city/
Shang–Zhou architecture seen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bronze ware,
and documents/the influence of the Shang–Zhou city architecture viewed
from Zhouyuan

Chapter 2: Bronze Culture

The definition of bronze cul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a general review of arch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Shangh–Zhou
bronzes/bronze mining and forging/kinds and models/decorative pat–
terns/Eastern–Zhou bronzes

Chapter 3: Writing Symbols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ten symbols on oracle bones in Chinese history/
inscriptions on Shangh–Zhou oracle bones/on bronzes/on clay objects/on
stone–drum

Chapter 4: Academic Thought and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Maj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ang–Zhou philosophy/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debates among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Chapter 5: Jade, Clay, and Lacquer Objects

Jade/clay/lacquer

Chapter 6: Art and Literature

The Book of Odes and the poems from the Chu/music and dance/
paintings/sculpture

Chapter 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engineering/astronomy and climatology/
mathmatics/physics/mining and smeltery/from shamanism to The Inner
Medicine of the Yellow Emperor/sericulture and silk weaving/The Classic
of Workers and The Classic of Mozi

Chapter 8: Social Lives

Currency/dressing/customs

出版の前言き

中國はエジプト、メソポタミヤ、インドヤとともに人類文明の發源地と並べられている。この四大發源地の中では、もっとも系統的、もっとも完全な形で古代文化を保存しているのは、ただわが中國だけである。中華五千年の文化には大量な文字材料だけでなく、その上極めて豊富な出土文物をもっている。そのうち、精美絶倫な青銅器、玉器、陶磁器、雕刻品、絵畫およびその他の芸術品や工芸品など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れらはわれわれの先祖がわれわれに遺した貴重な寶である。

わが國の優秀な文化遺産を継承し發揚させていくのは、新世紀へ向けてのわれわれ世代の出版人が辭することのできない責務である。一九九〇年、學林出版社は陝西省博物館からの有力な支持を得たうえ、王仁波先生が主編した大型の高級な図冊《隋唐文化》を出版した。それは図と文を並用し、図を主とした形を取っており、生き生きと隋唐兩時代における文化の精華を再現して、専門家や一般読者からの幅ひろいご好評を受けている。各方面の人々から、続けて同じ精美な形をもって中華五千年文化を系統的に紹介し、その歴史文化の絢爛綺麗さや發展の軌跡を再現するよう希望されている。それを受けてこのたびのシリーズ“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の全體構想が生まれたのである。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は全國一流の専門家を招いて編集される。かれらは文物、考古、歴史などの面にわたる理論的素養や実地調査の経験を持っている。編集に參與される専門家は出版社と共同參畫した結果、このシリーズはもっとも高いレベルの研究成果や最新の考古發現を反映し、なお一流のカラー刷り寫真や斬新な版式设计、きれいな印刷装幀によって製作し、學術性、知識性、鑑賞性、実用性の統一を目指すように努力する。“シリーズ”の一冊一冊はそれぞれ五千年歴史の中での欠けることのできない一環であり、歴史の連続性を反映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で、また五千年歴史の中においてそれぞれ個性を持つ存在でもあり、各歴史時期の文化がもっている特有な風貌を再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でもある。數多くの古代文化に関する研究書物の中において、“シリーズ”はその鮮明な特色や不滅な価値をもつことによって異彩を放てるのであろう。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は學林出版社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とが共同編集し、製作出版する。これは改革開放のもとで合作という形での出版事業を摸索する一つ有益なこころみである。本の中では問題、點や不備なところ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それに対する批評や叱正を厚く歡迎する。

“中華五千年文化系列”の編集出版の過程において、われわれにいろんな支持や助けを與えてくださった専門家、學者、編集校正やその他の業務に携わる人々、および各方面の責任者に対し、謹んで感謝の意を表する。



目錄

總 論

第一章 建築	14
第二章 思想和學術	56
第三章 史學	78
第四章 文學	98
第五章 戲曲與曲藝	124
第六章 藝術	154



第七章 工藝美術	292
第八章 傳統書業與轉型	352
第九章 科學技術	376
第十章 宗教	390
第十一章 風俗文化	414
第十二章 對外交流	438
後記/主要參考書目/圖片索引	

主編 朱誠如 副主編 任萬平

清代文化

學林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總論

清

王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至此中國封建社會已走過兩千多年的歷程，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其政治、經濟、文化經歷兩千年的演進，已經相當成熟。

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若以入關前肇興算起，已過三百年矣。政權綿延之長，與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宋、明相比，毫不遜色。因此，清王朝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歷史長河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王朝。

清王朝是我國境內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專制主義王朝。滿族原是居住於我國東北一隅之地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利用歷史的機遇，依靠其智慧和武力取得統治權。但要統治一個有兩千年封建文明史的封建國家，必須有過人的膽略和高超的政策和策略，清朝統治者義無反顧地肩起了這副重擔。

清王朝正處於整個世界大變革時期，即整個世界向近代社會的大轉型時期。西方殖民勢力以咄咄逼人之勢，力圖顛倒乾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求存圖強對於一個在封建制軌道上蹣跚了兩千多年的老牌封建制大國已經刻不容緩，清王朝艱難地肩起這個重任。

簡而言之，清王朝既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延續，又具有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不同的時代特點。我們在研究清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時候，必須把握其特殊性，才能總結出符合其特性的規律。

論及清代文化就是要把握清王朝的這些特殊性，根據清朝歷史發展的軌跡，指出清代文化發展走向和特點。根據清王朝的時代特點，我們把清代文化劃分為兩個時期來進行論述，即以鴉片戰爭為界，分為清前期文化和晚清文化。1840年以後，隨着外國殖民主義勢力的入侵，晚清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必然隨之而變化，具有與前期明顯不同的走向和特點。

1644年是明、清兩朝的分水嶺，也是一個風雲變幻、動蕩沉浮的年頭。這一年，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大順軍攻陷北京，大明王朝的崇禎皇帝被逼自縊煤山，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獻關降清，李自成臨危稱帝武英殿，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佔領京城，六歲小皇帝順治入關登基，大清朝終於取代了大明王朝。

清朝取代明朝，一個以少數民族滿族為統治民族的清政權要想真正取代根深蒂固的漢族統治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要在軍事上征服南明小朝廷，剿滅大規模農民起義，平息各地不斷興起的漢人抗清鬥爭，同時又要在文化上征服漢人，這更是一個艱巨複雜的長期鬥爭過程。

明清之際的社會動亂，從總體上看也應該說對中國文化發展是一場災難。連年不斷的民族戰爭和農民起義，使社會經濟不可能得到發展；社會經濟的凋敝，必然引發

上層建築文化發展的停滯。但另一方面，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也造就了一些對時代不滿、力主社會變革的思想家。面對清初的社會動亂，思想家們反思歷史、積極探求治世之道。在諸多思想家中，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脫穎而出，號稱清初三大儒。他們의思想和理論不僅影響整個清代，甚至遠及中國近代思想領域。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學者，其青年時代參加明末反閹黨鬥爭，清初又參加抗清鬥爭。他本為王陽明、劉宗周理學的重要傳人，但面對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的現實，思想隨着時代而變化，不再抱殘守缺、固守舊理學的思想障地。他明確提出做學問要經世致用，要能夠救國家於急難，要為國計民生所用，這與他當初參加反閹黨和抗清鬥爭行動是一致的。

順治十年（1653年），他撰寫《留書》一部，對君主專制政體進行抨擊，指出它是各種社會矛盾的危機的根源。隨着南明魯王政權的失敗，抗清復明無望的情況下，他開始隱居著述，企圖以著述來救世。在《留書》的基礎上，於康熙二年（1663年）完成了《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核心是對封建君主專制政體的系統批判，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發展。反對君主專制、宣導民主思想無疑是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像黃宗羲這樣直接抨擊封建專制是前無古人的，這在明末清初極端封建專制時代是十分難得的，它對後世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鬥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夷待訪錄》在針對專制政體的同時，又提出事關國計民生的經濟主張。他反對中國自古以來的“重農抑商”政策，主張“工商皆本”，發展商業，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他還主張“藏富於民”，將先哲的“富民”思想進一步深化和發揮。

顧炎武也是生當明末清初社會動亂之際的一位著名學者、思想家，他在明王朝危機四伏、即將傾塌之際，與江南士子結成復社，臧否時政，抨擊閹黨餘孽。後清兵南下崑山，國破家亡，逼迫顧炎武投身抗清鬥爭。但南明小朝廷一個個敗亡，江南的抗清鬥爭遭到清軍的殘酷鎮壓，抗清復明已經無望。絕望中的顧炎武決定以明朝遺民自守，往來於山東、北京、河北、山西、陝西等地，多次拜謁明孝陵，以明復興故國之志；與各地明朝遺民往還，聯絡抗清志士；考察邊防、研究西北地理志，以熟悉天下的地形，觀察時局變化，以圖東山再起，匡復明室；但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江山已改，非顧炎武一介書生所能逆轉。

身處明清之際，親歷明末動亂和清初的抗清鬥爭，顧炎武對封建專制的“獨治”予以無情抨擊，主張以“眾治”代替“獨治”，實際上直接針對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他還認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人心”即民心，“風俗”即制度，只有民心歸一，整頓制度，才能治理好國家。這種帶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顧炎武的主要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他的“經世致用”、“明道救世”的實學思想，在明末清初士大夫中產生深遠影響。他認為著書立說應該有益於世，否則空疏無用，他一生廣泛涉獵經學、史學、文學、輿地、考古等學科，就是為了“救世”之目的，就是為了國計民生而去探討和研究。這種不尚空談、嚴謹質樸的學風，這種講求致用、不求虛名的精神，對改變當時社會學術風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並為後世所仿效，對整個清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又一位著名學者和思想家，他目睹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清兵入湘，他舉兵抗清。抗清鬥爭失敗，投奔南明永曆政權，充任小吏，又敗，隱伏深山，開始著述，歷四十年，直至終亡。其哲學思想，體系縝密，影響深遠。所著哲學著作多種，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崇尚“以真知實踐為學”。他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見和獨到的思想體

系。他對宋明學術進行大膽的清理和批判，極力推崇張載的“太虛即氣”（即氣是構成宇宙的物質本體）的學說。認為宇宙萬物都是“變化日新”，事物都是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統一的。他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能（主觀）必副其所（客觀）”的正確命題，即認識必須符合客觀事物，客觀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認識是第二性的。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他認為“勢因理成”、“理勢合一”，“理”即發展規律，“勢”即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事情的發展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總趨向，兩者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他主張改革，反對君主專制。

王夫之治學同樣主張經世致用，著述要著“經世之大略”，要讓後人明其得失，予以效法。他推崇同時學者方以智講求自然科學的務實風尚，就是推崇學問能為社會所用。這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清初學者在國破家亡之後不得不選擇的一條治學道路。

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王朝的國力日趨強盛，經濟進一步繁榮，為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鑄就了清王朝前期文化上的眾多偉業。首先是康、雍、乾時期先後組織大批學者大規模地搜集、整理、編修、刊刻大量典籍文獻。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文物典籍汗牛充棟。從漢代至清代，前後印行大量典籍，清代佔其中大半，而康、雍、乾三朝尤多，《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就是這一時期編纂而成的。

《古今圖書集成》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開始編纂，完成於雍正三年（1725年），全書一萬卷，是僅次於《永樂大典》的最大類書。

《四庫全書》則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正式設四庫館開始，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完成編纂任務，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最後繕寫完畢。清廷為了編纂這部卷帙浩繁的大叢書，任命皇室郡王及大學士十六人為總裁，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及當時戴震、姚鼐、翁方綱、王念孫等著名學者主持其事。幾乎傾全國之力，匯編了這一部囊括古往今來一切主要著述的典籍總匯。《四庫全書》所收典籍達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這是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的空前壯舉，為保存和傳播古代典籍文獻、繁榮文化事業、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統治者主持編修《四庫全書》的主要目的是禁錮漢族知識分子的思想，炫耀其文治武功，因此在編纂過程中，不僅對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根據政治需要任意刪改，更有甚者，根據乾隆帝的旨意，對那些有礙清朝統治的“違礙”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查禁焚毀。據不完全統計，在開四庫館的十多年中，被銷毀的書總數至少在十萬部左右（大量是複本），這對中國古籍是一次巨大的摧殘。

康、雍、乾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日益強化，思想文化領域實行高壓政策。於是一部分知識分子迫於壓力，逃避現實，脫離政治，鑽到故紙堆中，尋章摘句，從事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校勘輯佚。於是考據學就在這種背景下形成，並興盛於乾、嘉時期。

從康熙末年到乾隆時期，考據學派主要分吳、皖兩大派。吳派以惠棟為代表，其學生江聲、余肖客、王鳴盛、錢大昕等人是吳派的主要成員，他們極力推崇和墨守漢儒的成說，“凡古必真、凡漢必好”，一切以漢儒的說法為準繩，這種尚古復漢的保守思想，束縛了吳派在學術上的發展。吳派學者中成就卓著的首推錢大昕。皖派以戴震為代表，他不僅是清代著名的反理學進步思想家，而且在考據學方面亦有諸多成就。吳派“求古”，皖派“求是”，兩者各有所求。皖派方法嚴密，富有創造性，為吳派所不及。因此皖派出現，很快成為考據學派的主流，使漢學發展到巔峰。應該說考據學派對古籍的整理、考訂、校勘、辨偽和輯佚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在考據學派所影響下的那種鑽到故紙堆中尋章摘句的學風，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種束縛作用，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壓抑了知識分子智慧的發展。

康、雍、乾時期整個思想領域仍舊是宋明理學佔據支配地位。宋明時期的理學經過清初進步思想家的抨擊和批判，到了康熙時期，已經失去了當初的盛勢；但是，由於從康熙帝開始極力提倡程朱理學，依靠皇權的支撐，理學仍是佔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

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在思想領域裡極力強化對漢族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的控制，利用宋明理學來控制漢人的思想。清初開始，封建統治者就極力宣導尊孔讀經。自康熙帝始，把宋明理學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被確定為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由於皇帝的宣導，朝廷內出現一大批“理學名臣”，像李光地、熊賜履、張伯行等人。他們上下呼應，使宋明理學盛極一時。

在宋明理學佔支配地位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反理學的思想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顏元和戴震。顏元青年時代篤信程朱理學，中年以後，開始感覺到深受理學之害，轉而向其宣戰。顏元還猛烈地抨擊程朱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慾”。程朱理學把人性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即所謂善和惡。顏元認為“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性都是氣質之性，離開氣質就不存在義理之性。因此不存在義理是善，氣質是惡，當然也就無所謂要去“存天理，去人慾”。

繼顏元之後的另一位著名反理學的進步思想家是戴震。他精通哲學，對於天文、地理、曆算、音韻、訓詁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在認識論上，肯定了從事物到感覺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即外界的客觀事物，通過人們的耳、目、鼻、口的接觸，才能感覺到聲音、顏色、味道，即有了客觀的外界事物，才能產生感覺，才能認識客觀事物。戴震還無情地揭露理學家的“存天理，去人慾”的虛偽性，明確提出人慾合理性的主張。他認為封建統治者以理禍天下，以理來殘殺人性，理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戴震對理學的抨擊以及“有慾而後有為”的主張，在當時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康、雍、乾三朝，是清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斷走向鞏固，社會經濟日趨繁榮、發展的時期，同時又是封建社會末期各種社會危機、階級矛盾不斷積累，逐漸走向激化的時期。這些社會現象反映在文學藝術領域中，湧現出一批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他們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式透視整個封建社會。他們的成就，最突出地體現在小說作品中，曹雪芹所著《紅樓夢》、吳敬梓所著《儒林外史》、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等，豎起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康、乾時期歷史學亦有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對明史的研究和修纂，成就卓著。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開館，至乾隆元年完成，官修《明史》，花了幾十年的工夫。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史料搜集之廣泛，編纂方法之嚴密，都堪稱上乘。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章學誠、全祖望等有貢獻的史學家。

清朝從康熙開始，西方的傳教士不斷地來到中國，他們帶來西方的人文理念、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西方的繪畫藝術。以意大利人郎世寧為代表的傳教士把西方的繪畫藝術在中國畫師中傳播，於是出現大量紀實性繪畫，為我們今天研究這一段歷史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資料。郎世寧、艾啟蒙、王致誠、賀清泰等西方傳教士，把西方繪畫技術和中國繪畫技術相結合，創作了一大批傳世佳作。

除了傳教士們傳播的西方繪畫技術，中國畫技術在清代前期亦有很大發展，出現許多著名的畫家，像焦秉貞、王翬、唐岱、宋駿業、王原祁、丁觀鵬、張為邦、金廷標、張宗蒼、舍昆等。

此外，乾隆時期在繪畫藝術方面崛起了一個新畫派，以“揚州八怪”為代表。“揚州八怪”即金農、汪士慎、黃慎、鄭燮、李鱣、羅聘、李方膺、高翔，這些人大都是遭遇坎坷而又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畫花鳥、人物方面，不囿成法，頗多創新，被傳統派目之為“怪物”。“揚州八怪”之一的鄭燮既是詩人，又是書

法家，詩、書、畫都很精通，三者巧妙結合，又為他人所不及。鄭燮在繪畫方面，最長於畫墨竹、蘭花，風格別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題畫也別具特色，不落俗套。

康、雍、乾時期，隨着國家的統一，生產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

首先是天文學和數學方面的發展。梅文鼎是這一時期傑出的天文曆算學家，他從事天文和曆算研究六十多年，頗多成就，其曆算著作達八十餘種。明安圖也是這一時期一位傑出的蒙古族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他是我國第一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學者，著有《割圓密率捷法》等數學著作。

這一時期中醫學也有所發展。著名醫學家葉桂，通過臨床實踐，在《傷寒論》的基礎上建立了溫病學的新理論，寫出了新的醫學著作《溫熱論》。乾隆四年（1739年），太醫院奉旨纂修一部《醫宗金鑑》，對中醫學進行匯集、整理、總結和訂誤，這是一部記錄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醫書。此外，《古今圖書集成》一書中，醫部全錄共計五百二十卷，搜集了我國歷代醫學典籍，也是我國古代醫學巨著。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生產的經驗極其豐富。康、雍、乾時期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總結各地農業生產經驗的區域性的農學專著也陸續出現。康熙年間劉應棠的《梭山農譜》，是關於江西地區的；丁宜曾的《西石梁農圃便覽》，是關於山東地區的；乾隆年間張宗法的《從農記》，是記載四川農業生產經驗的。

總之，康、雍、乾時期由於國家統一，國力增強，為文化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康、雍、乾三代帝王對文化發展都很重視，所以出現了文化較為繁榮的局面。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也正是這一時期，清朝統治者在採取懷柔、籠絡政策的同時，對於不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言行，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一方面收繳、銷毀和篡改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書籍，另一方面大興文字獄，扼殺新文化、新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文字獄，即“因文字賈禍之謂”。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歷代封建王朝屢興文字獄；而清代文字獄次數之多、處罰之嚴，實為歷代所罕見。清初統治者忙於軍事征服，沒有餘力來解決思想領域問題。在全國統一戰爭基本結束以後，國內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仍然十分尖銳，清朝統治者為了強化其在思想領域的統治，企圖通過暴力手段，來撲滅漢族人民的反抗意識，鉗制言論，禁錮思想，於是迭興文字獄。凡是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文字、著述和言行，一概被斥為“悖逆”和“狂吠”，羅織罪名，然後處以重典。從康熙到乾隆，前後大約一百二十年，據不完全統計，大小案件有九十多起；大部分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間，其中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至1782年）五年之間，就有將近四十起，文字獄的規模是空前的。

乾隆時期，文網之嚴密，羅織之苟細，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字一語，皆可鍛煉成獄，以致一時形成了吹毛求疵、深文周納的惡劣的社會風氣。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獄案有七八十起，其中很少有真正屬反對清王朝統治而罹禍的。大致一類是屬於觸犯忌諱，如有些皇帝專用字眼和詞語，一般臣民加以引用，就是僭越犯上。另一類屬吟詩作文時，用字不慎而被猜疑或曲解為有意影射而陷入文網的。此外，還有一類純屬歌功頌德、曲意逢迎，但因文字不當而致罪的，這種人最為可悲。

康、雍、乾三朝迭興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對象不僅是漢族知識分子，而且上有政府官員，下有一般平民。在嚴密的文網之下，廣大知識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議論朝政，不敢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被迫走上學術和現實脫離的道路，埋頭於故紙堆中，搞繁瑣的考據。清朝統治者通過文字獄，壓制了反清思想的傳播，嚴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領域，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

到了乾隆末年，一方面知識分子中的反清思想在嚴密的文網之下，基本上被鎮壓下去；另一方面各地人

民的反抗鬥爭起伏此起。清朝統治者把打擊矛頭轉向鎮壓農民起義。於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至1782年）大興文字獄高潮之後，文網稍疏，轉而改用籠絡、麻痹知識分子的政策。但康、雍、乾三朝屢興文字獄，對新思想的窒息、對社會風氣的毒化，已經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即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這就直接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思想文化的發展。

乾隆中期以後，階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而成為主要矛盾。這時，風起雲湧的人民反抗鬥爭、吏治腐敗、民生凋敝等社會問題，嚴重地威脅着清王朝的統治。在這種新形勢下，嘉慶朝不得不適時地對文化專制政策進行了調整。

嘉慶帝親政後，決定從處理實際問題入手，終結了在清朝推行了百餘年的以大興文字獄來打擊漢族士人的政策。嘉慶四年（1799年）二月，嘉慶帝在諭旨中，對過去因“偶以筆墨之不檢”就與叛逆同科的做法表示明確反對，所以嘉慶朝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興文字獄的事情。嘉慶朝文字獄的被終止，使當時的文化學術獲得了必要的發展空間，從而促進了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

與清代社會由盛轉衰和文化專制政策的調整相適應的，是經世致用思潮的復興和一批關注現實、關注政治的思想家的出現，如包世臣、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姚瑩等。他們除了關注現實政治，還關注漕運、鹽政、河工、農事等實政，抨擊弊政，對事關國計民生的許多重大問題提出改革方案。隨着西方殖民者的東侵和沙俄在北部邊疆的騷擾活動，不少學者開始了對邊疆史地的研究，提出了開發邊疆、鞏固國防、抵禦外侮的意見。嘉慶朝所實行的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對當時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嘉慶時期，清朝國力由盛轉衰。隨着時勢的變化，學術思想界隨之發生了激烈的變化。乾隆朝盛極一時的考據之風，走向偏枯，潛心考據的漢學家們開始關注社會現實，湮沒近兩千年的今文經學重新復興，盛行於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學風再度興起。今文經學與經世致用思潮的合流，開啓了晚清學術風氣的先河。在當時空前劇烈的社會動蕩的形勢下，漢學內部出現了從考據回歸義理的更新趨勢。其中，以焦循為代表的致力於新義理觀的疏注和以阮元為代表的主張漢、宋兼採，成為漢學內部自我更新趨勢的兩種傾向，他們也強調學以致用。受時代影響，部分理學家在闡釋程朱理學時，着重強調其經世功用。他們既以宣導理學為己任，同時又時時關注社會現實問題。他們對朝政中的諸多弊政，屢屢加以抨擊，其抨擊的矛頭，有時甚至指向了清代專制政制制度本身。

綜上所述，嘉慶時期，無論是漢學家還是宋學家，嚴峻的社會現實使他們具有了強烈的經世思想，正是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會通漢、宋的學術傾向。

清入關之初，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烈尖銳，出現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反對專制統治的思想家，是歷史的必然。反清的失敗，復明的無望，使他們開始反思歷史，探求治世之道，共同的結論是：（一）反專制；（二）走經世致用道路。應該說他們的探求是成功的。康、雍、乾時期，隨着國家的統一，國力增強，經濟不斷發展，為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也正是這一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的強化，導致文化專制主義的瘋狂，既編書又焚書；既重視文化，又大搞文字獄。這一時期輝煌的文化成就是——一批文化精英的心血造就的，也是那些不甘屈服的知識分子的屍骨堆就的。因此我們在肯定這一時期文化成就的時候，不得不指責統治者的專橫殘暴的手段。乾隆中期以後的停滯，使得嘉慶帝想有為而不能為。這位沒有大作為的皇帝對其祖父輩的文化專制政策進行了適度調整，即廢棄了文字獄那樣的高壓政策。這種相對寬鬆的政策，使得走向衰敗的嘉慶一朝文化上仍有一些長足的發展。

二

道光朝是清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此前是封建文化的延續，明顯帶着封建文明的痕跡；但隨着鴉片戰爭的戰敗，整個社會反思如潮洶湧，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外國公使駐京，在上海等地開闢租界地，海外資本主義文明滲透進來，嚴重地影響着近代文化的發展方向。新文化、新思想紛紛出現，成為時代的新寵。

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思想文化意識領域的激變引人注目。由於清代文字獄頻興，諸多文人士子怯於闡發義理，專注於考據詞章，以至於乾嘉時期形成了以考據訓詁為特徵而成就斐然的乾嘉學派。然而，時代的延續臨近近代的門檻，整理國故已經不能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因此出現了龔自珍、魏源等有識之士關注世情民隱，不滿萬馬齊喑的社會現實，強調“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蘄，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宣導改革社會弊政的主張。今文學說出現了復興，經世致用學說也萌芽綻露。

一般說來，今文經學從漢、宋以來綿延不絕，中間曾經有過低潮時期，但在清朝嘉、道年間重新復興，甚至至晚清末年成為各種學說中的顯學；其代表人物也經過了一個從莊存與、劉逢祿到龔自珍、魏源，最後歸結於康有為的長期過程，歷時逾百餘年之久；而龔自珍、魏源生長於道光朝時代，成為晚清今文經學承先啓後的人物。

龔自珍先從段玉裁究明考據，考釋文字；次從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再與常州派名家宋翔鳳切磋今文經學。因博取科舉功名之際已屆中年，仕途前程已是有限，於是不以官場仕途為意，閒來舞文弄墨，博覽群書。春秋大義、輿地史乘均雜閱眾說；經史叢談、金石碑帖、國朝掌故、世情民隱、西域佛禪廣泛涉獵，逐漸形成博大精深、蔚為大觀的思想體系，表現出一派評判社會、指點江山的豪邁氣度，強烈要求對道光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實施全方位的改革。

龔自珍汲取了今文經學的“張三世”、“通三統”學說的變異意識，引用《易經》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觀念，借鑒古典思想學說中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和論述，把人類社會從古到今一直到未來的發展歷程具體劃分為從“據亂世”、“昇平世”，再到“太平世”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的今文經學理念體現出“援經議政”的特點，以今文經學為武器向經世致用方向不懈努力，試圖喚醒沉澱在廣大士子內心的憂患意識。

魏源較龔自珍晚辭世達十六年，因而能夠更多地感受轉折時期中國社會的苦澀變化，感受到道光朝的艱難應變。他和龔自珍共同挖掘出今文經學中孔子是主張改制鼻祖的義理根據，可以賴以託古改制。他們批判社會的暮氣死寂，推崇自我個性，一改正統儒家思想宣導的諱言功利的風氣，鑽研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漕運、鹽法、河工等經濟問題。較之於龔自珍，魏源更傾向於經世議論，《海國圖志》、《籌海篇》提出強國禦侮的辦法，發出了“師夷長技”的呼聲，突破了傳統儒學的夷狄觀念，使儒學在新時代出現了昇華。到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張之洞等人把今文經學發展到巔峰。強勁的輿論鼓吹促成了戊戌變法的發軔。

在一部分思想家從古籍尋找出路的時候，緣於古代探究經濟之道的經世致用說重新勃發，並付諸實踐。在嘉慶、道光二帝求實風格的為政之道鼓動下，陶澍、賀長齡、林則徐、黃爵滋、姚瑩等封疆大吏們探究有關國計民生的漕運、鹽法、河工、人口、貨幣等社會現實問題，並在轄區嘗試展開活動。伊犁將軍松筠器重以罪戾放新疆伊犁的祁韻士，令其編纂《伊犁總統事略》；其後流人徐松亦得厚待，欣然增補編修《伊犁總統事略》，使該書成為囊括新疆自然與人文內容的百科全書，並得到了道光帝的賜名——《新疆識略》，命付武英